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A刊)核心期刊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收录期刊

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A)

2025. 3

VOL.18 NO.3

公共行政 评论

JPA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

(A刊)核心期刊

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A)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收录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收录期刊

6月15日出版

2025年第3期 总第105期

●专栏：政策执行研究

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公共政策的相机执行策略选择研究

..... 李胜会 李 丹 朱绍棠 1

地方社会政策执行的内在逻辑

——以“多校划片”义务教育改革为例

..... 曾 渝 蒋光明 20

●论文

专项整治治理基层数字形式主义何以有效？

——基于整治主体的分析

..... 张靖宇 甘 甜 过 勇 37

理解城市治理敏捷转型的复杂性及其运作逻辑	
——基于解构制度性行动情境的研究视角	
..... 陈廷佳 赵紫懿 孙 涛	57
基层治理中历史遗留问题何以产生？对政府决策中“当下主义”策略的案例分析	
..... 余成龙 郑晓华	78
激活“公”与“共”：占据结构洞的县域社会组织	
..... 林雪霏 单雅杰	98
信息干预与新业态从业人员养老保险的参保意愿：基于外卖骑手随机实验的	
实证研究	申梦晗 苏楚平 申广军 119
城市政府合作关系的不均衡性：基于长三角官员异地考察网络的研究	
..... 林钢健 徐元朔 张蔚文	138
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的联盟冲突与政策学习	
——基于倡议联盟分析框架	雷晓康 于林霞 157

●理论综述

公共管理研究中的元分析方法：进展、范式与方向	
..... 苗 青 朱星魁	175

●英文目录与摘要	196
----------------	-----

专项整治治理基层数字形式主义何以有效？

——基于整治主体的分析

张靖宇 甘 甜 过 勇*

【摘要】形式主义是困扰基层治理的顽疾，而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数字形式主义问题日益突出，地方政府试图通过专项整治的方式予以解决。然而，在保持当前行政体制的前提下，专项整治能否长期有效？已有研究通常认为专项整治是运动式治理的具体表现形式，由于存在共谋、动员成本高、打破科层组织的正常运转等问题，其成效存疑。然而，浙江省A市以党办、纪委、大数据局为主体成立了工作专班，专项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取得突出成效并在较长时期内得以保持，这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启示性案例。与以往研究不同，论文把视角聚焦于专项整治的主体，发现专项整治发起部门与被整治部门分属不同系统是解决共谋问题的关键。若发起部门还具有合理的权力配置结构，则此类专项整治可以充分调研获取真实信息，柔性协商制定科学方案，逆向动员解决执行困难，减少共谋提升监督质效，有效终结形成长效机制，在“信息”“方案”“执行”“监督”“终结”五个过程性要素上表现良好，达到如意的整治效果。这一发现既有助于拓展对运动式治理的理论认识，也为有效整治基层形式主义、提升基层治理绩效提供了实践启示。

【关键词】基层形式主义 数字化转型 专项整治 运动式治理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486 (2025) 03-0037-20

* 张靖宇，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候选人，清华大学纪检监察研究院研究助理。通讯作者：甘甜，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导师。过勇，清华大学纪检监察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感谢编委会、编辑部和匿名评审专家的宝贵修改意见。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23ZDA12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背景下基层政府条块协同体制机制创新研究”（23CZZ032）。

一、问题的提出

专项整治通常被视为中国特色的治理手段或工具，它以动员能力和运动性强为特点（徐岩等，2015），时常与专项治理、集中整治、动员式治理等概念交替使用^①，被视为运动式治理的重要手段，其实质是“权威体制下的权力实践”（潘泽泉、欧阳小娟，2023：74）。然而，专项整治的效果，尤其是长期效果，常被学界质疑，甚至有学者认为专项整治不仅不能产生长期效果，连短期效果都无法产生。因此，如何提升专项整治的成效成为一个兼具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重要问题。

围绕专项整治为何会失效的议题，目前学界给出了两类相异的解释。一是不可持续的整治，即专项整治短期有效，长期无效。专项整治往往在短期内集中资源进行高强度治理，希望在有限时间内迅速解决问题。这种做法在一段时间内确实会产生效果，但由于缺乏长期的制度支持和机制保障，其成效难以持续（周雪光，2012；杨志军、彭勃，2013）。二是形式化的整治，即专项整治连短期效果也无法产生。由于专项整治往往是具有时间期限的政治性任务，会给地方政府带来巨大的压力。在时间和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基层政府往往使用形式主义的手段进行应付和自保，想办法完成上级的考核指标，并不关注专项整治的实质效果（张京唐、芮国强，2023；周少来，2018）。而这些基层政府的行为也往往得到他们直接上级的默许，形成“共谋”，进而消解了专项整治的压力（周雪光，2008）。

上述研究成果认为，专项整治可能会带来形式主义问题。然而吊诡的是，现实中地方政府往往采用专项整治的手段去治理形式主义问题。从逻辑上来看，这一整治的可行性存在内在悖论。一些研究指出，专项整治并未达成“基层减负”“会议减负”的目标（麦佩清，2020；胡威、唐醒，2021），甚至存在“用形式主义破除形式主义”的现象（王新亚，2019）。这些研究印证了“专项整治无法有效整治形式主义，甚至会带来形式主义”的命题，然而，笔者在田野观察中却发现，浙江省A市^②成功运用专项整治这一政策工具，完成了对“数字形式主义”这一重要形式主义问题的治理。这一理论最可能案例（Most-likely Case）为我们重新审视和探讨专项整治与化解基层形式主义之间的关联提供了绝佳的观察窗口。由此，本文的研究问题是：作为一种典型的治理工具，专项整治化解基层数字形式主义的情境性要素是什么？其过程性机制又是什么？本文期待从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中提炼出一般性专项整治效能的理论线索。

① 当前，无论在实务界还是学术界，这些概念没有本质差异，均是指向非常规任务，与常规治理相对。本文遵循惯例，不对上述概念进行区分。

② A市为X市下辖的县级市。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框架

(一) 基层数字形式主义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现代社会逐步进入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为基础的数字时代,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然而,技术在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的同时,数字留痕、强制推广、多头填报等数字形式主义问题不断凸显,并日益成为基层社会治理亟待解决的难题。

追溯概念谱系,数字形式主义作为学术话语的建构,本质上反映了技术治理与传统官僚积弊的耦合过程。学界普遍将其界定为数字技术加持下形式主义的新变种(孙会岩、王玉莹,2023),是“形式理性”对公共管理“实质理性”的替代过程(董石桃、董秀芳,2022)。因此,要了解数字形式主义,必须了解形式主义。陈朋(2020)认为,形式主义是以表面形式替代实质内容的工作作风,被视为“庸俗的工作作风和方法”,它通常表现为“学风不正,学用脱节;文山会海,空话套话;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蜻蜓点水,走马观花;不切实际,不求实效;落实不力,工作疲沓”(郑一明,2018:26),其实质是主观主义和功利主义。从成因来看,现有研究普遍认为现行制度结构是形式主义的核心诱因,在“上下对口,左右对齐”的职责同构原则下(朱光磊、张志红,2005),地方通过压力型体制和层层加码等方式,使得基层不得不以形式主义的方式应付和自保(张京唐、芮国强,2023;周少来,2018),由此出现了“体制性空转”的现象(桂华,2022)。

数字形式主义作为一种特殊的形式主义,在具有形式主义共性特征的同时也具有高技术性这一个性。数字形式主义,就是技术没有赋能治理,反而成为“技术负能”的异化情形(胡卫卫等,2021)。许多研究对数字形式主义的特征进行了梳理总结。第一,在建设层面,作为数字技术运用的载体,各类政务应用的开发本身已经成为基层的巨大负担。重平台建设而轻运维(钟伟军、阎馨,2024)、整体性推进变为碎片化建设(赵玉林等,2020)是数字形式主义在政务应用建设层面的突出特征。第二,在运用层面,由于政务应用在数量和设计层面的不合理,本该提升效率的数字技术反而增加了基层负担,如社区工作人员需要负责太多的政务应用,没时间走村串户(赵玉林等,2020)。第三,在考核层面,不合理的考核会进一步加剧基层数字形式主义。由于数字技术的自身特征,能够轻易产生活跃度、回复率、点赞率等量化指标,这使部分领导在考核监督下属时过度依赖这些量化指标,而忽略了服务质量与服务效率、民众满意度等维度(黄新华,2023)。

（二）专项整治的主体特征

如前所述，目前学界对于专项整治的成效存在两种质疑。一些学者认为专项整治在短期内可以打破部门界限以集中资源，取得成效，但长远来看，由于缺乏制度保障，这些成效不可持续；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专项整治只会激发形式主义的应对，连短期成效都无法产生。同样是对于专项整治效果的批判，现有文献却展现了不同的现实观察和解释路径。这启示我们专项整治本身存在异质性，需要进行更细致的观察。专项整治是集中部门资源共同行动的过程，其本质是“多主体参与协作”的集体行动过程。从跨部门协作（Cross-sectoral Collaboration）的角度看，协作主体的特征，如权力关系、利益差异、目标一致性、信任程度等会直接影响协作的最终结果（Emerson et al., 2012; Ansell & Gash, 2008）。因此，当我们进一步剖析专项整治主体时，会发现它们在不同时空中存在较大差异，因而很有可能带来不同的整治效果。换言之，当前学界关于专项整治有无效果的争论可能与忽视整治主体的差异性有关。

许多研究将专项整治主体与被整治对象具有高度一致性（以下简称为“同质主体”）作为其基本假设，强调专项整治的主体与被整治对象处在同一系统，利益相关导致专项整治的压力被消解。在分层负责的行政体系中，基于长期的工作互动，上级政府及相关条线部门与下级对口职能部门之间存在着人情、业务、资源、权力等方面的相互依赖（周雪光，2008），甚至成为“政绩共同体”（于建嵘，2011），因而在专项整治工作中往往会在“一阵风”的同时存在“共谋”“应付”等倾向。概言之，由于整治主体与被整治对象之间存在较高程度的网络连接和资源依赖特征，甚至具有利益绑定关系，被整治对象可能会“有恃无恐”，因此专项整治的效果难以得到保证。例如，倪星、原超（2014）的研究发现，某市市监局发起的“清无”专项行动就被整治主体与被整治对象之间的“弱排名激励”和人情网络所消解。

不过，也有学者注意到在部分专项整治中，整治主体与被整治对象分属不同系统（以下简称为“异质主体”）。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利益相关带来的“共谋”问题大大减少，有助于专项整治取得成效。例如，王辉（2018）注意到区一级层面展开的前后三次“活禽禁宰”的专项整治成效各不相同，而“成立具有矩阵制特征的专项整治领导小组”，从而避免部门利益的干扰是第三次专项整治取得成功的关键。当然，值得注意的是，此类专项整治的长期效果仍然缺乏有效保障。例如，黄扬（2023）在研究中发现某区的校外培训治理存在短期有效、长期无效的特征。所以专项整治结束后，这些校外培训机构就走上了“试探性违规”的道路，在实质上恢复校外培训业务的同时试探监管部门的“底线”，最终摸索出了“合规的边界”。

由此可见，尽管当整治主体与被整治对象存在较大差异时，专项整治具有

跨越利益绑定、摆脱资源依赖等优势,但其长期效果仍然“时好时坏”。换言之,此类专项整治虽然解决了激励有效性问题,但仍需要其他机制来确保其长期效果。

鉴于当前对整治主体与被整治对象分属不同系统的专项整治研究较少,且我们在田野观察中发现此类专项整治不仅在短期有效,还进一步取得了长期效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因此,本文主要关注异质主体的专项整治,特别是剖析其实现长期有效的机制。

(三) 整治主体与治理成效:一个权力视角下的分析框架

专项整治主体与被整治对象处于党政体制中,共同构成了一个严密的权力系统,而整治效果则可以理解为权力主体作用于权力客体后的结果。所以,要讨论整治主体如何取得治理成效,必须回到其与被整治对象之间的权力关系。

1. 专项整治中的主体:构成、特征与权力关系

专项整治工作往往是上级高度重视的非常规性治理事务,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唐皇凤,2007),在当前“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责任体系下,地方党委通常对专项整治工作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和主体责任,并通过“中心工作”模式,成立诸如领导小组、工作专班等组织以推进相关工作。然而,当前地方治理往往面临多条并行的中心工作。因此,这种宏观领导的模式,可能面临信息不对称、时间分配不均、专业性不足、注意力不聚焦、人员不足等困境,不得不依赖相应的组织抓手来协助完成相应的中心工作。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构成专项整治工作专班这一整治主体的相关部门往往在实践中发挥最大的能动作用。

与此同时,许多学者指出,地方党委政府作为委托人基于法律和政治制度拥有象征性权力,即上级对下级拥有领导和控制权;但是,由于作为代理人的下级拥有信息优势,因此可能具有实质的权力(曹正汉,2014;周黎安,2014;周雪光,2014)。换言之,对专项整治负有领导责任的地方党委因信息不对称可能面临“象征性权力强,实质性权力弱”的局面。因此,专项整治有效的关键往往在于构成整治主体的各职能部门如何发挥能动作用,把地方党委政府所拥有的象征性权力转化为实质性权力,真正推动被整治部门配合工作,从而解决治理难题,提升整治效果。那么,该如何实现象征性权力向实质性权力转化呢?换言之,其转化的“抓手”何在?一些思想家指出,象征性权力往往可以通过权力资源整合的方式来转化为实质性权力(Bourdieu, 1991; Foucault, 1980)。从权力的来源或基础的角度看,领导者通常拥有五种经典权力资源,它们是奖赏权、惩罚权、法定权、参照权和专家权(Frech & Raven, 1959)。

不过,在专项整治过程中,这些权力并非同等重要。具体来说,在专项整治过程中,奖赏并非常见的手段,因为整治的目标通常是解决某个特定的治理

难题，而非鼓励某些行为，因此奖赏权不被纳入考量。法定权本身就是一级地方党委政府象征性权力的一部分，但容易缺乏直接的执行力和操作性（周雪光，2014），难以单独发挥作用。参照权主要涉及领导者的个人魅力，这在制度化和组织化的专项整治中可能不具备操作性。

与奖赏权相反，惩罚权是一种专项整治中常用的权力。在很多时候，专项整治发起部门能够将专项整治事项纳入被整治对象年度的目标责任制考核中，并且凭借其考核的权力惩罚在专项整治中不配合的部门。更具有典型意义的惩罚权运用者是纪委和监委。纪委和监委通过基于党纪及政纪的惩罚权力，可以对专项整治对象的行为进行约束和惩罚，具有较强的执行力和震慑力。

与此同时，一些部门由于本身的专业和知识特性，在具体互动中具有专业优势，这一优势往往能够使其拥有“专业权力”（French & Raven, 1959）。与此同时，强技术特性的行政部门往往拥有自身的外置专家团队，专家力量同样是强化其专业权力的重要依托。换言之，在涉及较为专业的整治事项时，通过专业部门自身和其联络的外部智库的专家权力，地方党委政府可以获得专业知识和技术支持，提升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和科学性（张云昊，2023）。这种权力能够提供具体的解决方案和技术手段，有助于把象征性权力转化为实质性权力。大数据局是具有专业权力的典型部门，其负责的数字化建设、管理等工作具有很高的专业门槛。同时，大数据局往往也拥有自己的数字化建设专家库，可以向“外脑”寻求支持。

综上，在诸如治理形式主义等专项整治工作中，惩罚权和专家权是最具操作性和效果的两种权力形式。如果整治主体能够有效具备这两种权力，就能够把象征性权力有效地转化为实质性权力。

2. 专项整治的过程性要素

专项整治尽管通常被归入组织管理的范畴，但是这一行动也可以被视作解决特定治理问题的政策过程。公共政策学的奠基人拉斯韦尔和卡普兰认为，政策是一种含有目标、价值与策略的大型计划（Laswell & Kaplan, 1970）。专项整治作为地方政府一项重要的中心治理任务，具有特定的目标和策略，也含有一定的价值，符合政策的一般特征。作为政策的专项治理，自然具有政策过程的一般要素。

许多学者对政策运行过程进行阶段划分，如将公共政策系统的运行分为元政策制定、政策制定、后政策制定、反馈这四个阶段（Dror, 1969），将政策分为情报、建议、规定、行使、运用、评价、终止七个功能环节（Laswell, 1956），将政策过程的功能活动划分为问题的形成、政策方案的制定、政策方案的通过、政策的实施、政策的评价五个环节（Anderson, 2002）。综观这些研究，虽然对政策过程性要素的概括各不相同，但具备一些共性。首先，这三种分类都包含

政策制定之前的过程性要素,即开展调查、获取信息、界定问题等过程。在本文的研究中使用“信息”这一过程性要素予以概括。其次,这三种分类都包含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价与终止这三个过程。由于专项整治针对的问题一般更为具体,其政策文本一般使用工作方案予以指涉,因此本文使用“方案”这一过程性要素指代政策制定的过程,使用“执行”要素指代政策执行的过程,使用“终结”要素指代政策评价与终止的过程。除了上述西方学者的观点外,陈振明(2003)认为政策过程还包含政策监控这一重要环节,其作用是对政策过程各个环节加以监督和控制。我们使用“监督”要素指代政策监控的过程。因此,我们认为在专项整治中,涉及信息、方案、执行、监督、终结等关键过程性要素。

综上,结合整治特征和关键过程要素,本文构建了异质主体专项整治的分析框架(见图1)。接下来,本文将通过案例呈现和分析提炼异质主体专项整治的过程性机制,尤其是分析整治主体如何通过整合惩罚权和专家权,将象征性权力转化为实质性权力,最终取得理想的整治效果,从而为更全面、动态地理解专项整治提供理论洞见(Theoretical Insigh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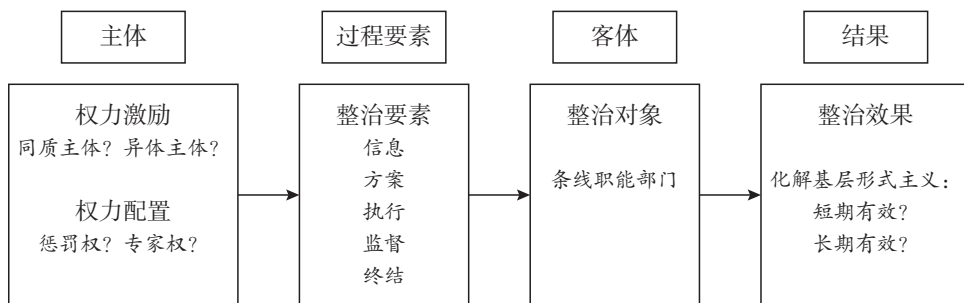


图1 异质主体专项整治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案例选取、分析单位与资料来源

（一）案例选取与分析单位

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基于“演绎-归纳”的逻辑呈现方式(甘甜,2025),通过对浙江省X市下辖的县级市A市开展“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专项整治的情况进行分析,归纳专项整治有效治理基层形式主义问题的情境性要素和过程性机制。对案例的选择基于以下三项考虑:首先,A市经济发达,承担了许多数字化改革项目,许多市属部门均自行开发政务应用,最后形成了数量规模最为庞大的政务应用群。按照理论预测,A市面临的专项整治阻力最大,

形式主义之风最容易反弹。其次，现有研究通常认为，“高位推动”是“运动式治理”能够在短期内取得显著成效的原因。但是，虽然“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专项整治被A市市委、市政府列为中心工作，得到了市委书记和市长的重视。但工作属性决定了这一任务的相对重要性不足，无法得到领导最顶格的支持^①。事实上，A市专项整治工作专班的组长仅为市委办主任和市纪委常务副书记（该专班有2名组长），这一配置与许多动辄以书记或市长作为组长的专项整治相比略显薄弱。然而，在预期阻力大、领导支持相对较弱的情况下，A市专项整治取得了突出成果，成为地市甚至全省范围内的“尖子生”，具有反常性，满足了“最可能案例”的原则。对“最可能案例”的剖析有助于发现因果机制（Gerring, 2006），实现公共管理知识的生产目标（甘甜等，2023）。

（二）资料来源

本研究的资料来源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笔者多次赴A市调研，通过与专项整治负责干部、乡镇干部、村社干部的接触交流，知晓专项整治的开展过程及其在基层落实的情况。除了访谈外，笔者还参与了上级部门对专项整治落实情况的检查工作，进一步了解专项整治的工作细节。二是向A市纪委申请查阅的各类调研报告、走访记录、汇报材料等档案资料，这些资料帮助笔者全面了解专项整治的实施情况，并对调研结果提供支撑。三是新闻报道等辅助资料，可以强化案例解释力。

为了对专项整治过程有更深入的了解，我们还对X市和其下辖的其他3个县市，以及这些县市所属的镇街、村社进行了短期调研。来自地市以及其他县市的经验证据可以检验来自A市的经验证据，起到三角验证（Triangulation）的作用。

四、案例呈现与分析

（一）案例呈现：专项整治的实施过程

一个典型的专项整治过程，遵循“发现问题—开展整治—总结回顾”的基本过程，A市“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专项整治也不例外。首先，随着政务应用的不断增多，基层感受到的数字形式主义压力也不断增加，这一问题得到了省纪委的高度重视。随后，在省纪委的推动下，各级党委政府开展“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专项整治，并取得了良好成效。本部分将呈现这一过程。

^① “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整治是个很复杂的工作，特别需要协调统筹的艺术，毕竟党委的重心还是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上。”（访谈记录 20230918-XAJ）

1. 整治前的基层数字形式主义负担

现有研究对基层数字形式主义有较丰富的研究,从整体来看,部门本位主义带来的碎片化建设和唯上主义带来的价值偏离是造成基层数字形式主义的重要原因(赵玉林等,2020)。这在A市的表现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部门本位主义造成的碎片化建设问题。各个部门,甚至部门内部的各个科室都有独立开发自有政务应用的倾向。这就导致了登录损耗、重复填报数据等问题。首先,各部门甚至各科室纷纷开发自己的政务应用,导致一个基层工作人员往往不得使用多个账号登录多个应用进行操作,这种对账号的记忆本身就成为繁重的负担。乡镇受访者告诉我们:“专项整治前,每个镇街都有专人去保管账号密码。”(访谈记录20240627-XAX^①)其次,由于各应用开发团队并不统一,运维投入也不一致,基层工作人员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要面对响应速度慢、登录难等问题,在登录应用的过程中就花费了大量时间。最后,由于开发应用时缺乏系统规划,部分政务应用设计雷同,功能相近,但由于开发层级或开发主体不同,未能兼并整合或进行数据共享,基层需要在不同的应用上重复录入填报数据。

第二,技术主义带来的价值偏离问题。政务应用开发的原初目的是提高行政效率,减少行政工作负担,因此基层的实际工作流程和体验应当成为政务应用建设的重要考虑因素。但在实践中,政务应用的开发往往过度重视可视化的技术指标,忽视基层的使用感受,造成应用设计不合理、考核不科学等问题。首先,部分政务应用设计时未考虑工作实际,不仅不能助力工作推进,反而会造成新的负担。例如:“某应用要求低保户每月登录,并进行人脸识别确认身份,完全没有考虑到很多低保户因病致残,没有智能手机操作能力,最后只能由村镇干部代办。”(访谈记录20230922XAJ)政务应用仅仅是工具,如果没有考核要求,基层完全可以使用“好用”的政务应用,弃用“不好用”的政务应用,避免负担。但是由于部分单位实行了不科学的考核制度,基层干部不得不将精力放在完成指标而非完成工作上,造成了大量负担。部分问题上报类应用规定了畸高的月度最低整改问题数量,迫使基层工作人员自己“制造问题,自己整改”。基层干部反映,这样的工作不仅没有效果,还会恶化干群关系:“这种考核要民众配合,对干群关系影响也挺大。比如,两个安监员在企业里互相踢烟头报问题。干部在电线杆上贴‘牛皮癣’,拍照,揭掉,拍照,这种的话老百姓怎么看?”(访谈记录20230918-XAX)

^① 访谈记录编码规则:数字部分代表访谈日期,前两位字母代表访谈地点,最后一位字母代表访谈对象单位,如J代表纪委、X代表乡镇。

2. 专项整治的发展过程

2023年1月，X市对A市B街道“指尖上的工作情况”进行调研，发现现行使用的政务应用存在功能实现不合理、开发碎片化、考核不科学等问题。该报告得到浙江省纪委的高度重视。同年2月，浙江省开展“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专项整治，目标是为基层减负，提升基层获得感。专项整治部署后，省、市、县各级均成立工作专班，负责推动相关工作。各级专班负责处理同层级部门因开发应用造成的问题。下级专班如发现上级部门开发的应用对本级基层造成负担，可通过专班渠道进行反馈，由对应层级的专班进行处理。本案例主要聚焦A市工作专班对同级部门开发的应用进行整治的情况。

2023年2月，A市成立工作专班，由市委办公室牵头，市纪委和市大数据局共同参与。在实际工作中，主要工作由市纪委统筹推动。成立专班后，市纪委开展乡镇调研，摸清基层实际使用的政务应用列表，以及基层干部对这些应用的使用感想与态度。

在摸清政务应用底数的情况下，工作专班分两次与各应用开发部门协商整改方案。2023年2月初，纪委分管领导首先约见了应用较多的几个部门。随后，工作专班以市委办公室的名义召集各部门，专班领导、部门领导与三位外请的电子政务专家对每个应用进行了整改方案讨论。经过两天一夜，出台了工作专班与部门均认可的整治方案。

整治方案对部门本位主义和唯上主义的问题提出了针对性措施。首先，面对碎片化建设问题，A市采用“应统尽统”策略。市大数据局监测每个部门在系统上的应用数量，尽量确保一个部门至多保留一个应用，以解决科室自建应用的问题。对于不同部门间业务相似、功能相近的应用，工作专班也会督促整合。例如，把6个民情民访类的应用统一整合为一个系统；又比如，针对查询镇街信息需多头登录的现状，将多个应用统一整合成信息查询引擎，极大提升了工作效率。其次，面对价值偏离的问题，A市采用“应减尽减”“应优尽优”的策略。对使用效果差、基层反映强烈的应用，A市采用直接停用或调整考核的办法，最终直接削减镇街应用11个，减少应用考核19个，取消全部转发类、评论类考核。同时，A市也对系统卡顿、功能不科学、不够智能的应用进行升级优化，提升其运行质量。

3. 专项整治的主要成效

自2023年2月开始，A市“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专项整治持续约一年时间，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专项整治长效机制运行良好，在2023年专项整治结束后，2024年以来，以大数据局为主导的“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常规治理机制依然在发挥作用，有效阻止了新的基层数字形式主义的产生。

第一，从应用数量上来说，A市市本级开发的应用数量从2023年1月的

218 个下降至 2023 年 7 月底的 105 个，减少超 50%。其中涉及镇街村社的应用数量从 63 个下降至 18 个，减少了超 70%。

第二，最能反映整治效果的是基层工作人员的实际感受。A 市纪委监委于 2023 年 6 月对其下辖的 580 个村社的负责人进行走访调研，了解他们对整治前后基层负担变化的感受。整理走访记录后，作者发现 94.5% 的受访者认为负担明显减少，5.5% 的受访者认为负担没有减少或减负效果不佳^①。调研走访记录的具体情况如表 1 所示，可以看到，绝大部分基层干部确实感受到专项整治的减负作用。

表 1 走访记录

整治效果	比例（%）	典型回答
负担明显减轻	94.5	各类 APP、小程序减少了很多，减轻了工作负担 整治以来，村干部的负担减轻了，有更多的精力集中到别的工作中
减负效果不佳	5.5	有些变化，但不是很明显 没有明显感觉 建议把具体工作落到实处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第三，从工作时长上来看，A 市评估“基层干部日均使用应用时间从 2 小时降至 1 小时，一些科室减少了 1 个人的工作量”。（文档资料 20230806XAJ-1）这与作者对 A 市基层干部的访谈情况基本吻合。

第四，为巩固专项整治的效果，防止形式主义反弹回潮，A 市优化了电子政务项目立项联审机制，推动建立政务应用绩效评价机制与退出机制。在 2023 年专项整治结束后，A 市大数据局采用“遏制增量，优化存量”的治理策略，持续治理数字形式主义。在遏制增量方面，在 2024 年初的电子政务立项审核中，共超过 15 个应用因有可能加重基层负担等原因被要求暂缓立项。最终，2024 年仅 37 个政务应用项目立项，相较 2023 年的 78 个，2022 年的 89 个，下降超 50%。在优化存量方面，A 市大数据局强化对政务应用的绩效评价，督促对使用人数少、基层意见大、存在数据重复报送等情况的应用进行削减整合。2024 年上半年 A 市共关停整合 20 多个政务应用，其中有 7 个涉及基层应用。

（二）案例分析：“异质主体”+“实质性权力”与基层形式主义的化解

整治主体与被整治对象分属不同系统确保了整治主体具有完成整治目标的强激励，而完善的权力配置使整治主体具有完成整治目标的能力。异质主体与实质性权力的结合使得“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专项整治在信息、方案、执行、

^① 整理自 A 市纪委监委提供的文档资料（20230919XAJ-3）。

监控、终结这五个过程性要素上都表现良好，最终顺利实现了化解基层数字形式主义的政策目标。

1. 信息：充分调研吸收基层信息与专业信息

充分真实的信息是制定合理公共政策的必要条件。在异质主体的情况下，专项整治发起部门和被整治部门分属不同系统，二者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这对专项整治的进行造成了严重阻碍。例如，访谈中一位工作专班的工作人员谈道：“我去和某部门领导讨论一个重要应用的删减问题，但是我对这个应用不了解，领导给我举了各种数据和例子（论证这个应用的重要性），我就很难辩驳。”（访谈记录 20230920-XBJ）不过，惩罚权和专家权可以帮助整治主体吸纳基层和专家的意见，以此打破被整治部门的信息垄断。

市纪委的惩罚权使其具有较强的权威性，乡镇干部会对纪委说实话。同时，拥有惩罚权的市纪委也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可以组织深入的基层调研。不过，基层干部对政务应用并没有深入的研究，他们反映的意见时有错漏，和具体的应用情况对应不上。针对这一问题，大数据局通过专家授权获得的相关信息就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市大数据局掌握专业信息，大部分政务应用都挂在统一的一体化数字资源系统（以下简称“IRS 系统”）上。大数据局可以给出 IRS 系统上存在的政务应用名单，这对“摸清底数”工作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大数据局可以直接调取应用的运行信息，包括注册人数、月活跃度等等。运用合适的手段对数据进行分析，大数据局可以有效地识别政务应用使用中存在的形式主义行为。“我们会在系统日志中记录政务应用的全部使用行为，对这些日志进行分析可以有效识别异常行为。例如，如果有人频繁地登录一个应用，却不开展具体的业务，那么大概率就是在刷活跃度了。”（访谈记录 20240626-XAD）。

2. 方案：柔性协商形成可行方案

“运动式治理”的一大特点是通过政治和行政干预在短期内动员大量资源达成治理效果。然而，由于这种效果的达成往往是通过牺牲其他方面的利益来实现的，因而不可持续。而在异质主体的情形中，由于发起部门和被整治部门并不在同一系统内，发起部门无法对被整治部门进行直接的行政干预，必须通过柔性说服的方式推进工作，这就使一个既能达成整治目标又能获得被整治部门认可的方案出台成为可能，而这样的方案才能长期运行。不过，柔性协商形成科学方案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景。发起部门的惩罚权和专家权是这一愿景成为现实的重要保障。

虽然专项整治发起部门中存在市委办公室、市纪委这样的强势部门，但是被整治部门中也存在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这样的强势部门。因此，在专项整治过程中，协商说服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手段。事实上，上级纪委也明确要求在工作中“以说服为主，不能以权压人”。（访谈记录 20230919-XAJ）为此，A

市纪委先由分管常委出面,与7个应用较多的部门进行协商,然后再由市委办公室出面,召集所有待整改应用有关部门进行了两天一夜的应用审核会。每个部门逐个过会审核,共同协商形成了各方认可的整改方案。

对于这个过程,接受访谈的纪委干部有个形象的比喻:“这就像是拆迁,每个应用的情况都不同,每个部门的想法也不同,必须充分沟通。”(访谈记录 20230919-XAJ)在双方沟通的过程中,有时双方会各退一步,在妥协中达成一致意见。例如,某宣传学习类应用被要求考核转发数量,导致基层干部被迫频频往村民大群中转发相关内容,基层对此类考核意见很大。但是部门也有自己的工作需求:“理论学习类内容的推广是必须要做的核心工作,但是这种工作的推进只能依靠组织的力量,不能全靠自发自觉。”(访谈记录 20230920-XBX)最终的整改方案是,该部门保留对转发数量的考核,但将要求的转发数量大幅减少了,这样既优化了基层干部的体验,也确保了部门基本的工作要求。

在上述过程中,惩罚权和专家权发挥了重要作用。惩罚权是方案能够形成的重要保障。一位受访的纪委干部说:“纪委对大部分部门的威慑力很强,但是当遇到组织部门的时候,我们一般请市委办公室出面。”(访谈记录 20230919-XAJ)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现象,是因为组织部门比较强势,专项整治如果想要拥有对组织部门的惩罚权,必须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市委的市委办公室出面进行协商。此外,专家权是方案科学性的重要保障。一方面,大数据局的干部具有良好的数字素养,保证了整改方案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大数据局掌握了电子政务专家库,当遇到需要引入外部智力资源判断的专业问题时,大数据局可以通过咨询等形式邀请专家提供意见、参与决策,获得更科学准确的整改方案。

3. 执行:允许“逆向动员”解决执行难题

在本研究的情境中,一些基层反映强烈的政务应用开发部门层级很高,一些政务应用不合理考核的背后是上级部门的不合理要求。因此,在执行专项整治方案时,上级部门是绕不开的难题。而异质主体提升了基层“逆向动员”上级部门,进而促进高层级部门解决问题的能力。

异质主体让基层部门更敢于如实反映上级部门的问题,不同系统间的壁垒阻止了上级部门采用行政手段惩罚基层的可能性。例如,A市作为调研报告的诞生地,揭露了许多政务运用存在的问题。因此,不少上级部门直接与A市联系询问情况。面对这种询问,A市纪委干部表示“压力很大”。不过,由于部门间壁垒的存在,这些上级部门的询问并未影响A市纪委,也未影响专项整治工作。

另外,异质主体让基层部门可以对上级部门施加影响,处理上级部门开发的政务应用。在同质主体的情形下,即使基层部门可以向上反映意见,是否处理的决定权仍然把握在上级部门手中,基层部门没有能力干预。但是,在异质

主体的情境中，基层部门反映的意见首先被汇总到上级纪委处，再由上级纪委对相关部门提出，这一过程极大地提升了问题的解决效率。事实上，通过纪委系统的中转，一些基层反映强烈的X市层面甚至浙江省级层面开发的应用也得到了整改。

4. 监督：避免“共谋”提升监督成效

上下级部门间的“共谋”和“变通”是消解专项整治压力的重要原因。在同质主体的情形下，由于上级部门（发起部门）需要依赖下级部门（被整治部门）完成更高上级布置的目标与任务，因此双方形成了“政绩共同体”，使作为监督者的上级部门对下级部门在完成专项整治要求上给予通融和帮助，稀释了专项整治的刚性压力。同时，由于下级部门也了解上级部门的行为逻辑，知道其不会“逼迫过甚”，因此在应对专项整治时也会有所保留。

然而，在异质主体的情境中，发起部门与被整治部门分属不同的系统，并不存在“政绩共同体”的情形。因此，发起部门可以刚性执行专项整治的任务要求，被整治部门也会发挥全部力量来应对相关要求。在推动专项整治落实的过程中，A市纪委约谈提醒了8家不够重视的单位，通报了27家进度缓慢的单位。被整治单位对来自纪委的约谈和通报非常敏感和重视，均在被约谈或通报后加强了对应用的整治工作，完成了之前协商制定的整治方案。

“我们手里有各种‘武器’来针对落实不力的单位，不过实际上只用到了约谈和通报这样的‘轻武器’就达到了效果，各个单位还是很配合工作的。”（访谈记录 20230920-XAJ）

5. 终结：促进“政策替代”形成长效机制

由于高行政成本等问题，专项整治的持续时间往往较短。当专项整治结束后，被压下去的问题往往反弹回潮。从政策终结的理论视角来看，这意味着大部分专项整治的政策终结是“功能的终结”——这是一种最彻底的政策终结方式（陈振明，2003）。当专项整治完成功能的终结后，其本身具有的治理功能消亡，且没有其他政策填补这一空白，自然会造成问题反弹回潮。而在专项整治具有异质主体的情形下，惩罚权和专家权相互配合，强化了发起部门对相关问题的常规治理行动，使其在专项整治后可以取而代之，促使专项整治以“机构的终结”甚至“政策的终结”的形式结束，其实质治理功能由发起部门的常规治理继承。

这里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对数字形式主义的常规治理本身就是发起部门之一——大数据局的职能。为何大数据局在专项整治前不能很好履行这一职能，在专项整治后却能形成有效治理呢？专项治理对常规治理的促进主要体现在“完善制度”和“重塑权威”两个方面。

在完善制度方面，虽然专项整治之前大数据局有应对数字形式主义的制度

规范,如对政务应用的立项审核、绩效考核与退出机制。但是这些制度可行性较低,实际运用的情况较少。究其原因,大数据局缺乏惩罚权,很难推动落实这些自身不够科学完善且会影响其他部门实际利益的制度。而由于制度无法实际运行,很难完善迭代,从而进一步形成了恶性循环。

而在专项整治过程中,具有惩罚权的工作专班要求落实相关制度,倒逼制度得到完善。以立项审核为例,在专项整治过程中,大数据局出台《A市涉及基层应用建设规范及管理制度》,对如何审核政务应用是否增加基层负担进行了细致的规定,并设置专人负责基层负担的审核。完善的制度为大数据局的治理工作赋予了合法性,有利于工作的开展:“以前制度不完善,现在有制度,就能跟职能部门谈了。”(访谈记录 20240626-XAD)

更微妙但也更重要的改变发生在思想层面,也就是专项整治通过凝聚共识起到了“重塑权威”的作用。专项整治改变了职能部门的观念,让他们意识到政务应用带来的数字形式主义是个重要问题,所以会配合大数据局的工作,甚至主动提出要求整改:“今年有的部门主动提出要将自己的‘派单’(任务分配)应用和其他部门的应用整合在一起,这在之前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之前部门会觉得自己业务自己知晓就行,不愿意和别的部门共用渠道。”(访谈记录 20240626-XAD)此外,专项整治也改变了大数据局的观念。在专项整治之前大数据局未完善相关制度,一个重要原因是大数据局认为:“业务的东西还是以部门为主,大数据局不好去判断部门给基层的东西究竟是好是坏。”(访谈记录 20240626-XAD)而专项整治让大数据局对自己工作的边界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愿意在改善基层负担方面主动与业务部门沟通,提出整改意见。这一点最典型的体现是大数据局对应用考核方面的治理。在专项整治后,大数据局不仅仅会关心应用本身,还会关心业务部门是否会通过应用进行不合理的考核。具体来说,大数据局在审核政务应用立项时,会关注每个模块的功能,一旦发现该模块具有排名等功能,就会联系对应部门,确保这些功能不被用于可能引发形式主义的考核。在专项整治的过程中发生的上述思想观念的改变,本质是所有部门(包括大数据局本身)都承认了大数据局在数字形式主义治理方面的主导地位。诚如韦伯(1997)所言,权威本质上就是一种独立于任何利益之外的、要求实际被统治者“顺从”的权力。而这种思想观念的转变,使大数据部门在数字形式主义整治领域获得了权威,这就重塑了数字形式主义治理的权力结构。

五、结论与讨论

(一) 研究结论

形式主义是困扰基层治理的顽疾。近年来,随着政府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推

进,“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等新型形式主义问题日益突出。面对形式主义问题,在大幅度体制改革的“治本”之策不现实的情况下,专项整治这一政策工具成为许多地方的首选方案。然而,无论是从理论还是现实的角度出发,专项整治对形式主义的治理效果都存在争议。本文通过对A市“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案例的剖析,指出异质主体的专项整治可以解决专项整治中普遍存在的“共谋”问题。若搭配合理的权力配置,异质主体的专项整治在信息、方案、执行、监督、终结这五个一般政策过程性要素上均有良好表现。具体而言,异质主体和合理的权力配置促使专项整治发起部门能通过充分调研获取真实信息,柔性协商制定科学方案,逆向动员解决执行困难,减少共谋提升监督质效,进而有效终结并形成长效机制。

(二) 讨论

通过对异质主体专项整治治理基层数字形式主义的研究,本文还可以对两方面的问题做进一步讨论。

第一,探讨分析框架中发起部门的特殊性。在异质主体专项整治分析框架中,发起部门担任了非常关键的角色:它们要充分调研获得信息,要和被整治部门博弈协商,要做好监督工作,要构建长效机制,甚至还要“逆向动员”上级部门。在本案例中,A市纪委作为主要发起部门有效完成了这些职责,保障了专项整治的有效性。然而,纪委作为强势的部门,在地方政治生态中具有几乎独一无二的地位。从纪委身上归纳得到的理论框架具有多大的外推性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一方面,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纪委确实具有特殊性,其特殊性体现在它天然具备对被整治部门的惩罚权。而当异质主体专项整治的发起部门不具备惩罚权时,确实可能无法达到良好的治理效果。另一方面,纪委的角色并不是无可替代的。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了市纪委对市委办公室力量的借用^①和对组织部门协调能力的认可^②。市委办公室负责考核部门绩效,组织部门负责评价考核干部,这些职能也很容易被作为惩罚权行使。因此,本文认为,当市委办公室和组织部门作为发起部门时,此类专项整治也能取得良好的成效。进一步说,这些公认的强势部门以外的一般职能部门也能借助专项整治的契机,“借助”基层党委和政府的力量获得惩罚权,以推动此类专项整治获得良好成效。例如,在某区创5A级景区的专项行动过程中,旅游部门以该区党政主要领

① “在统筹协调时,要学会借力,比如在和业务部门开会‘过堂会审’整改方案的时候,我们请市委办公室出面牵头组织会议,营造出一种党委出面的效果。”(访谈记录20230724-XAJ)

② “要协调这么多部门,除了纪委外,就只有组织部门能做到了。”(访谈记录20230921-XBJ)

导成为相关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为契机,“借助”惩罚权,重塑了自己与其他部门间的关系,“交通、治安、宣传、安全、卫生等部门与旅游部门的互动规则被重新构建,变成了被考核、被指挥甚至被监督(孟威、保继刚,2019:71)”。因此,本文建构的理论框架仍然具有外推性。

第二,关于专项整治治理形式主义的限度讨论。如前文所述,专项整治治理形式主义在制度结构、组织过程等方面存在困境。虽然异质主体的专项整治由于其特殊的组织结构,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些问题,但仍然有一些遗留问题难以解决。本文对“部门本位主义”和“建立长效机制”两个问题展开讨论。“部门本位主义”及其带来的政务应用碎片化建设、数据重复报送等问题是基层数字形式主义的重要来源。在本案例中,A市通过“应统尽统”的方式整合削减应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这些问题。但必须承认的是,一些问题是专项整治无法解决的。最重要也最典型的问题是部门间数据壁垒造成的负担问题。在访谈中,许多基层受访者对于公安部门不愿开放基础人口信息,导致自身还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前往村社摸排这一情况表示不理解。但是,我们仍然认为专项整治对于数字形式主义的治理效果是可观的。一方面,尽管有些基础性问题无法得到解决,但专项整治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部门本位主义”造成的基层负担。另一方面,很多基层数字形式主义问题并不源自“部门本位主义”,比如不合理的考核等,而专项整治对这些问题的治理成效非常可观。“建立长效机制”是异质主体专项整治的重要优势之一。专项整治结束半年以后,笔者再次回到A市调研,评估数字形式主义常规治理运行情况。笔者和不同层级的受访者均认为基本不存在反弹回潮的问题,长效机制运行良好。但是,半年的时间仍然不够长。在后续研究中,笔者会继续追踪这一案例,观察长效机制的演化情况。

当然,本文作为一项个案研究,还存在不足之处。首先,A市专项整治的效果评估是本文论证的关键。但笔者缺乏相应资源在专项整治前后对基层干部进行大规模调查,只能通过田野观察、访谈及A市相关部门提供的文档资料进行研究,资料占有仍不够完整、丰富。其次,本文的案例为“最可能案例”,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如A市是全国百强县市,浙江省作为全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其体制内的风气也有特殊性。因此,本文也面临一定的外部效度挑战。

参考文献

- 曹正汉(2014). 统治风险与地方分权——关于中国国家治理的三种理论及其比较. 社会, 34(6): 52-69.
- Cao, Z. H. (2014). Political Risks and Decentralization: The Comparison of Three Models on Chinese Governance.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34(6): 52-69. (in Chinese)
- 陈朋(2020). 形式主义的多重诱因及其治理之道. 理论探讨, (1): 136-141.
- Chen, P. (2020). The Multiple Causes of Formalism and Its Governance Approach. *Theoretical Investigation*, (1): 136-141. (in Chinese)
- 陈振明(2003). 政策科学: 公共政策分析导论.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Chen, Z. M. (2003). *Policy Science: An Introduction to Public Policy Analysis*.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 Press. (in Chinese)
- 董石桃、董秀芳 (2022). 技术执行的拼凑应对偏差: 数字治理形式主义的发生逻辑分析. *中国行政管理*, (6): 66-73.
- Dong, S. T. & Dong, X. F. The Patchwork Response Bias of Technology Implementation: The Emergence and Correction of Digital Governance Formalism.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6): 66-73. (in Chinese)
- 甘甜、凌争、吴件、李春生、叶志鹏、钟宗炬 (2023). 连接理论与田野: 公共管理研究的知识生产机制. *岳麓公共治理*, 2(4): 82-109.
- Gan, T., Ling, Z., Wu, J., Li, C. S., Ye, Z. P. & Zhong, Z. J. Connecting the Theory and the Field: Knowledge Production Mechanism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YueLu Public Governance*, 2(4): 82-109. (in Chinese)
- 甘甜 (2025). 超越“归纳偏见”: 案例研究的多元呈现逻辑. *岳麓公共治理*, 4(1): 62-78.
- Gan, T. (2025). Beyond “Inductive Bias”: The Multiple Presentation Logic of Case Studies. *YueLu Public Governance*, 4(1): 62-78. (in Chinese)
- 桂华 (2022). 乡村治理中的体制性空转——基层形式主义的成因与破解.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43(2): 107-115.
- Gui, H. (2022). Institutional Idling in Rural Governance: The Cause and Solution of Grassroots Formalism. *Journal of Jishou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43(2): 107-115. (in Chinese)
- 胡威、唐醒 (2021). 我国基层会议减负效果的实证研究——基于 A 省 780 名社区党支部书记的调查. *中国行政管理*, (1): 85-90.
- Hu, W. & Tang, X. (2021).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Meeting Reduction at the Grassroot Level: A Survey of 780 Community Cadres in Province A.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1): 85-90. (in Chinese)
- 胡卫卫、陈建平、赵晓峰 (2021). 技术赋能何以变成技术负能? ——“智能官僚主义”的生成及消解. *电子政务*, (4): 58-67.
- Hu, W. W., Chen, J. P. & Zhao, X. F. (2021). How Does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Turn into Technological Disempowerment? The Formation and Dissolution of “Intelligent Bureaucracy”. *E-Government*, (4): 58-67. (in Chinese)
- 黄新华 (2023). 数字形式主义的表征、根源与规制. *国家治理*, (6): 31-35.
- Huang, X. H. (2023). The Representation, Root Causes, and Regulation of Digital Formalism. *Governance*, (6): 31-35. (in Chinese)
- 黄扬 (2023). “试探性违规-选择性容忍”: 对运动式监管失灵的组织学解释. *公共管理评论*, 5(2): 25-48.
- Huang, Y. (2023). “Tentative Violations” and “Selective Tolerance”: An Organization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Failure of Campaign-style Regulations. *China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5(2): 25-48. (in Chinese)
- 马克思·韦伯 (1997). *经济与社会*. 下卷.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Weber, M. (1997). *Economy and Society. Volume II*.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Chinese)
- 麦佩清 (2020). “基层减负年”减负了吗? ——基于某直辖市 A 区 259 个社区的调研. *公共管理评论*, 2(3): 111-121.
- Mai, P. Q. (2020). Has the “Year to Reduce Burdens on Community-Level Officials” Been Successful? Based on a Survey of 259 Communities in District A of a Municipality. *China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3): 111-121. (in Chinese)
- 孟威、保继刚 (2019). 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 5A 景区治理的政策网络分析. *旅游学刊*, 34(4): 66-76.
- Meng, W. & Bao, J. G. (2019). From Campaign-style Governance to Daily Governance: A Policy Network Analysis of “5A” Tourist Attractions in China. *Tourism Tribune*, 34(4): 66-76. (in Chinese)
- 倪星、原超 (2014). 地方政府的运动式治理是如何走向“常规化”的? ——基于 S 市市监局“清无”专项行动的分析. *公共行政评论*, 7(2): 76-96+171-172.
- Ni, X. & Yuan, C. (2014). How Local Government Campaign-style Governance Became Routinized? A Case Study for Special Actio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7(2): 76-96+171-172. (in Chinese)
- 潘泽泉、欧阳小鹏 (2023). 双轨动员与协同治理: 专项治理行动中有效动员的机制与策略——基于 C 市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的实证研究.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7(5): 73-80.
- Pan, Z. Q. & Ouyang, X. J. (2023). Dual-Track Mobilization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echanisms and Strategies for Effective Mobilization in Specialized Governance Action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Special Improvement of Self-Built House Safety in City C.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37(5): 37-80. (in Chinese)
- 彭勃、赵吉 (2019). 折叠型治理及其展开: 基层形式主义的生成逻辑. *探索与争鸣*, (11): 92-101+158-

- 159+161.
- Peng, B. & Zhao, J. (2019). Folded Governance and Its Unfolding: The Logic of Formalism at the Grassroots. *Exploration and Free Views*, (11): 92-101+158-159+161. (in Chinese)
- 孙会岩、王玉莹 (2023). 制度逻辑: 基层社会治理中数字形式主义问题的反思与超越. *电子政务*, (2): 107-114.
- Sun, H. Y. & Wang, Y. Y. (2023). Institutional Logic: Reflection and Transcendence of Digital Formalism Issues in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E-Government*, (2): 107-114. (in Chinese)
- 唐皇凤 (2007). 常态社会与运动式治理——中国社会治安治理中的“严打”政策研究. *开放时代*, (3): 115-129.
- Tang, H. F. (2007). Campaign-styled Management of Normal Society: A Study on the “Severe Crackdown” Policy in China’s Public Security Governance. *Open Times*, (3): 115-129. (in Chinese)
- 王辉 (2018). 运动式治理转向长效治理的制度变迁机制研究——以川东 T 区“活禽禁宰”运动为个例. *公共管理学报*, 15(1): 71-83+156-157.
- Wang, H. (2018).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of Campaign-style Governance Transforming into Long-effective Governance: Taking Killing Forbidden of Live Poultry in T District of East Sichuan as a Case. *Journal of Public Management*, 15(1): 71-83+156-157. (in Chinese)
- 王新亚 (2019). 半月谈评论: 减负没减负, 要让实际效果说了算. 中国新闻网: <https://www.chinanews.com/gn/2019/03-18/8782927.shtml>. 2024 年 2 月 15 日访问.
- Wang, X. Y. (2019). *Half-Monthly Talk Comment: The Burden Hasn’t Been Reduced—Let the Actual Effect Be the Judge*. China News: <https://www.chinanews.com/gn/03-18/8782927.shtml>. [Accessed February 15, 2024]. (in Chinese)
- 徐岩、范娜娜、陈那波 (2015). 合法性承载: 对运动式治理及其转变的新解释——以 A 市 18 年创卫历程为例. *公共行政评论*, 8(2): 26-46+179.
- Xu, Y., Fan, N. N. & Chen, N. B. (2015). Legitimacy Loading: A New Explanation for the Political Campaign in China—18 Years of “Creating a National Sanitary City” in a Chinese City.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8(2): 26-46+179. (in Chinese)
- 杨志军、彭勃 (2013). 有限否定与类型化承认: 评判运动式治理的价值取向. *社会科学*, (3): 15-24.
- Yang, Z. J. & Peng, B. (2013). Limited Negation and Typological Recognition: The Value Judgement Orientation of Campaign-Style Governance.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3): 15-24. (in Chinese)
- 于建嵘 (2011). 破解“政绩共同体”的行为逻辑. *廉政文化研究*, 2(1): 95.
- Yu, J. R. (2011). Deciphering the Behavioral Logic of “Performance Community”. *Anti-corruption and Integrity Culture Studies*, 2(1): 95. (in Chinese)
- 张京唐、芮国强 (2023). 变与不变: 数字形式主义的表象、本质与底层逻辑——基于“压力型体制”的视角. *河南社会科学*, 31(6): 31-41.
- Zhang, J. T. & Rui, G. Q. (2023). Change and Invariance: Representation, Essence and Bottom Logic of Digital Formal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essure Based System”. *Henan Social Sciences*, 31(6): 31-41. (in Chinese)
- 张云昊 (2023). 中国公共政策过程中的专家参与机制研究——分析社会学的视角. *社会学研究*, 38(1): 183-204.
- Zhang, Y. H. (2023). Mechanisms of Expert Participation in China’s Public Policy Process: An Analytical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Sociological Studies*, 38(1): 183-204. (in Chinese)
- 赵玉林、任莹、周悦 (2020). 指尖上的形式主义: 压力型体制下的基层数字治理——基于 30 个案例的经验分析. *电子政务*, (3): 100-109.
- Zhao, Y. L., Ren, Y. & Zhou, Y. (2020). Formalism at Fingertips: Digital Governance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under Pressure-oriented Systems: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30 Case Studies. *E-Government*, (3): 100-109. (in Chinese)
- 郑一明 (2018). 形式主义源于错位的政绩观. *人民论坛*, (1): 26-27.
- Zheng, Y. M. (2018). Formalism Originates from Misplaced Performance Views. *People’s Tribune*, (1): 26-27. (in Chinese)
- 钟伟军、阎馨 (2024). 技术的多重建构: 基层常规任务何以导致数字形式主义? ——基于 Z 市 M 镇的考察. *电子政务*, (5): 119-128.
- Zhong, W. J. & Yan, X. (2024). The Multiple Reconstructions of Technology: How Do Routine Tasks at the

- Grassroots Level Lead to Formalism in Digital Forms? Based on an Investigation in M Town, Z City. *E-Government*, (5): 119-128. (in Chinese)
- 周黎安 (2014). 行政发包制. 社会, 34(6): 1-38.
- Zhou, L. A. (2014). Administrative Subcontract.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34(6): 1-38. (in Chinese)
- 周少来 (2018). 乡镇政府缘何容易陷入“形式主义泥潭”. 人民论坛, (1): 22-24.
- Zhou, S. L. (2018). Why Are Township Governments Prone to Fall into the “Formalism Quagmire”. *People's Tribune*, (1): 22-24. (in Chinese)
- 周雪光 (2008). 基层政府间的“共谋现象”——一个政府行为的制度逻辑. 社会学研究, (6): 1-21+243.
- Zhou, X. G. (2008). Collusion among Local Governments: The Institutional Logic of a Government Behavior. *Sociological Studies*, (6): 1-21+243. (in Chinese)
- 周雪光 (2014). 从“黄宗羲定律”到帝国的逻辑: 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历史线索. 开放时代, (4): 108-132+7-8.
- Zhou, X. G. (2012). From the “Law of Huang Zongxi” to the Logic of the Empire: The Historical Lead of the Logic of Chinese State Governance. *Open Times*, (4): 108-132+7-8. (in Chinese)
- 周雪光 (2012). 运动型治理机制: 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再思考. 开放时代, (9): 105-125.
- Zhou, X. G. (2012). Campaign-Style Governance: Revisiting the Institutional Logic of China's National Governance. *Open Times*, (9): 105-125. (in Chinese)
- 朱光磊、张志红 (2005). “职责同构”批判.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 101-112.
- Zhu, G. L. & Zhang, Z. H. (2005). A Critique of “Isomorphic Responsibility” Governmental System.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1): 101-112. (in Chinese)
-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2021). 江西: 以强有力监督措施推动“双减”工作落地见效.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https://ccdi.gov.cn/yaowenn/202112/t20211214_158119.html, 2024年2月15日访问.
- Central Commission for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National Supervisory Commission. (2021). *Jiangxi: Promo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with Strong Supervision Measures*. Website of the Central Commission for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National Supervisory Commission: https://ccdi.gov.cn/yaowenn/202112/t20211214_158119.html [Accessed February 15, 2024]. (in Chinese)
- Anderson, J. E. (2002). *Public Policymaking*.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 Ansell, C. & Gash, A. (2008).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18(4): 543-571.
- Bourdieu, P. (1991).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Emerson, K., Nabatchi, T. & Balogh, S. (2012).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fo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2(1): 1-29.
- Freidson, E. (1988). *Professional Powers: A Study of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Formal Knowled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French, J. R., Raven, B. & Cartwright, D. (1959). The Bases of Social Power. *Classics of Organization Theory*, 7(311-320): 1.
- Foucault, M. (1980).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Gerring, J. (2006). *Case Study Research: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ia, K. & Chen, S. (2019). Could Campaign-Style Enforcement Improv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a's Centr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spection.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45): 282-290.
- Laswell, H. D. (1956). *The Decision Process, Bureau of Governmental Research*. Maryland: University of Maryland.
- Laswell, H. D. & Kaplan, A. (1970). *Power and Society: A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Inqui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Wang, F., Wang, M. & Yin, H. (2022). Can Campaign-style Enforcement Work: When and How? Evidence from Straw Burning Control in China. *Governance*, 35(2): 545-564.
- Dror, Y. (1969). *Public Policymaking Reexamined*. San Francisco: Chadler Publishing Company.

责任编辑: 黄冬娅

英文目录与摘要

JPA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 18 No. 3, 2025

●SYNOPSIS: Policy Implementation Study

Policy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under Certainty and Uncertainty: A Study on Discretionary Decision-Making in Public Policy Shenghui Li, Dan Li & Shaotang Zhu

Abstract Examining the discretionary strategy selection of implementers—who serve dual roles as both loyal agents and local interest representatives under conditions of certainty and uncertainty helps unpack the “black box”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analyze their behavioral logic. By leveraging the discretion shaped by certainty and uncertainty, along with considering the pressure of policy performance evaluations,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power-pressure” model. Within this model, implementers adopt four strategies: fluctuating implementation, symbolic implementation, political implement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implementation, leading to four corresponding outcomes: short-term effectiveness, poor effectiveness, significant effectiveness, and mixed effectiveness. Through a comparative multi-case analysis of four major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policies in China, the study reveals the mechanism behind implementers’ discretionary strategy selection in contexts of certainty and uncertainty.

Key Words Certainty; Uncertainty; Differential Coping;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The Logic of Local Social Policy Implementation: The Case of “Multi-School Zoning” Reform for Compulsory Education Yu Zeng & Guangming Jiang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formulated and implemented reforms such as the “Multi-School Zoning” policy to promote educational equity. This study examines local variations in policy implementation mainly from four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including administrative pressure, public demand, career incentives for officials, and developmental social policies. It reveals that local policy implementation simultaneously pursues two primary objectives: equity and development. By coding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policies of 283 prefecture-leve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and conducting event history analyses, this study finds that when the growth of land revenue slows down, local governments tend to promote equalization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resources. This conclusion reflect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mplementation of educational equity policies and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findings provide valuable theoretical insights and empirical references for improving equal access to basic public services and advanc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Education Equity; Developmental Social Policy; Multi-School Zoning; Compulsory Education;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ARTICLES

How Can the Special Strike Campaign of Grassroots Digital Formalism Be Effective?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Campaign Initiators Jingyu Zhang, Tian Gan & Yong Guo

Abstract Formalism is a persistent challenge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and the issue of digital

formalism brought about by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Local governments have attempted to address this problem through special strike campaigns. However, under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ve system, can these campaigns achieve long-term effectiveness? Existing studies generally view special strike campaigns as a specific manifestation of campaign-style governance. Due to issues such as collusion, high mobilization costs, and disruption of the normal functioning of bureaucratic organizations, the effectiveness of such measures remains questionable. Nevertheless, City A in Zhejiang Province established a dedicated task force led by the Party Office, the Commission for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the Big Data Bureau to tackle “formalism at the fingertips,” achieving notable results and maintaining them over an extended period. This provides us with an insightful case study. Unlike previous research,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initiators of special strike campaigns and finds that having the initiating departments and the rectified departments belong to different systems is key to solving the issue of collusion. Furthermore, if the initiating departments possess a rational power structure, this kind of special strike campaigns can effectively carry out thorough investigations to obtain genuine information, engage in flexible consultations to formulate scientific plans, employ reverse mobilization to overcome implementation difficulties, reduce collusion and enhance supervision quality, and ultimately establish long-term mechanisms. This approach performs well across five procedural elements—information, planning, execution, supervision, and conclusion—achieving desirable rectification outcomes. This finding not only expands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of campaign-style governance, but also provides practical insights for effectively addressing grassroots formalism and improving grassroots governance performance.

Key Words Grassroots Formalism;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pecial Strike Campaign; Campaign-style Governance

Understanding the Complexity and Rationale of Agile Transformation in Urban Governance: A Research Perspective Based on Deconstructing Institutional Action Situations

..... Tingjia Chen, Ziyi Zhao & Tao Sun

Abstract Agile governance provides new mindsets and alternatives for urban governance in the digital age. Aiming at conceptual development, existing research focuses on normative discussions of agile governance with illustrative cases, and develops a set of agile principles. However, urban governance system is complex and multifaceted. Current research struggled to provide generalizable theoretical explanations and rigorous empirical analyses for the complexity. This study brings local public economy theory to agile governance research, and examines the rationale of urban agile transformation by employing action situation as the unit of analysis. The authors conducted a three-year continuous fieldwork on the “Holistic Smart Urban Governance” practice of J District in W municipality. The study finds that, firstly, agility varies in both quality and frequency across different levels of action situations. The contents of agile transformation at various action situations are different. As the level of action situation deepens, agility diminishes, and stability becomes prominent. Secondly, the interaction among action situations determines the overall effectiveness of the agile practice. The incompatible local institutions constrain the agile transformation of local public service production and provision. Thirdly, non-governmental entities an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tools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agile transformation at the lower-level action situations, even in the absence of intentional comprehensive design and agile mindsets. However, as the level of action situation deepens, rational

choices and proactive actions by the government become crucial. This study advances the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agile governance in academia, and provides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spurring agile transformation in practice.

Key Words Agile Governance; Urban Governance; Action Situation; Public Service

How Do Historical Legacy Issues Arise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A Case Analysis of the “Presentism” Phenomenon in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Chenglong Yu & Xiaohua Zheng

Abstract Historical legacy issues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are not unresolved due to prolonged waiting, but rather because the “policy window” has not been further opened to the “decision-making window.” The “presentism” strategy in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is the deep-seated cause of such problems. The case of Coastal Village Q demonstrates that early officials achieved accelerated development through “active presentism,” stacking current resources and compressing current costs, yet left problems for future generations. Successive officials regarded these legacy issues as social risks and addressed them promptly through “passive presentism,” such as delaying, escalating, transferring, or patching up the problems, which also led to their continuous postponement. Consequently, the continuous decision-making continuum of “presentism” by local governments at different times has made problems that should have been resolved initially increasingly difficult to solve as institution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s evolve. In fact, under the time pressure brought by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nd social risks, local governments’ choice of “presentism” as a coping strategy is largely situational rationality. The paradox lies in that the external conditions granting it rationality will inversely weaken its rationality in the future, thereby leading to the continuous reproduction of historical legacy issues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Key Words Historical Legacy Issues; Grassroots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Presentism”; Time

Activating “Public” and “Common”: County-Level Social Organizations Bridging Structural Holes Xuefei Lin & Yajie Shan

Abstract The rural livelihood supply network typically involves both the government-led public sector and the locally rooted common sector. Both sectors operate as closed systems, independently and in parallel, relying on differentiated organizations and resources. The Y Foundation in Xiong Town occupies the structural hole between the two sectors, serving as a bridging mechanism. It integrates existing resources from both public and common sectors through strategic alliances, joint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and other collaborative methodologies. The Y Foundation in Xiong Town leverages the charity organization model to conduct volunteer activities and deliver specialized services, thereby driving innovative production in livelihood supply. Through government-society cooperation, it effectively enhances the quality and expands the coverage of local livelihood provision systems. The bridging role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rural areas is driven not only by the rational considerations of local governments to enhance their foundational power but also by the societal demand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philanthropy, rather than being a result of a strong side taking over the other side. This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society stems from the clan social network, the philanthropic culture, and stable government-business connections in rural areas. Together, these three elements form

a balanced distribution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power and facilitate government-society elites to engage in collective action based on local moral values and norms. Therefore, research on social organizations anchored in county-level societies can uncover indigenous characteristics of government-society interactions and innovative institutional pathways therein.

Key Words Livelihood Supply Network; Bridging Intermediary; Government-society Interaction; County-level Space; Rural Society

Information Intervention and the Willingness of Flexible Workers'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 Pension: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Experiment Menghan Shen, Chuping Su & Guangjun Shen

Abstract Flexible workers constitute a significant part of the labor force. Current policies related to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se workers in social pension primarily encourage voluntary participation. However, in practice, a large portion of flexible workers are not enrolled in social pension. This paper employs randomized experimental methods to study the impact of information intervention on the willingness of workers in food delivery couriers to take up social pens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providing information about the benefits of pension insurance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couriers'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as well as their willingness to extend the duration of their participation and increase their contributions. The increase in willingness is more pronounced among groups with higher education levels, higher incomes, older psychological ages, those planning to work as couriers long-term, and those with higher financial literacy. Additionally, information intervention reduces the preference for having male children among these workers, potentially helping to address the imbalance in the gender ratio in China.

Key Words Information Intervention; Social Pension; Take-up; Flexible Workers; Randomized Control Experiment

The Inequality in Municipal Governments' Cooperation: A Study Based on the Network of Offsite Visits by Municipal Official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 Gangjian Lin, Yuanshuo Xu & Weiwen Zhang

Abstrac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relies on a balanced and reciprocal network of municipal cooperation. However, existing studies mostly simplify municipal cooperation to undirected and equal connections, overlooking the differences in cooperation willingness and resource investment, namely the cooperation inequality. This study uses large language models to identify 16,039 cooperative offsite visit events from over 720,000 government website news data, constructing a panoramic network of official offsite visits among 41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from 2010–2023. It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equality in informal cooperation among municipal government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overall cooperation inequality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shows a declining trend, with heterogeneity across different cooperation fields and levels. At the city level, both efficiency logic and administrative logic jointly determine the cooperation strategies between municipal governments, affecting cooperation inequality between different cities and forming complex cooperation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The study innovatively uses large language model technology for empirical research on local government networks and conduct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bilateral cooperation inequality for the first time, providing a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the current state

and future path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in urban agglomerations.

Key Words Offsite Visits; Large Language Model; Local Government Network; Yangtze River Delta; Cooperation Inequality

Alliance Conflict and Policy Learning in Glob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 Xiaokang Lei & Linxia Yu

Abstract Glob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overnance has gone beyond the scope of simple technical regulation and evolved into a deep game involving the ethical foundation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der. As a strategic technology with significant non neutrality characteristics, AI is becoming a new carrier of value system competition among major powers, and the struggle for governance dominance has become a strategic priority for major economies. However, the uncertainty of technological iteration combined with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has led to a dual alien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ecosystem, characterized by fragmented rules and value camps. There are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trong regulatory alliance” and the “weak regulatory alliance” in terms of technical ethics, rule making power, and cross-border jurisdiction. The existing governance mechanism is difficult to resolve the coordination dilemma caused by thes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However, the ethical paradigm of “intelligence for good”, multi-level governance practices, and professional dialogue platforms constructed b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provide the possibility to break through the governance deadlock. Based on the initiative alliance framework, it is suggested to establish a three-level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the core layer strengthens institutional compliance, the auxiliary layer optimizes dynamic coordination, and the influence layer improves 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 This three-dimensional design can ensure the human centered orientation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enhance the regional adaptability of governance plans, and ultimately achieve a positive cycle of technological ethics and human values.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overnance; 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 Strong Regulatory Alliance; Weak Regulatory Alliance; Policy Learning

●THEORETICAL REVIEWS

Meta-Analysis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Progress, Paradigms, and Directions

..... Qing Miao & Xingkui Zhu

Abstract As a powerful methodological tool for reconciling inconsistent research findings, meta-analysis is exerting a growing influence on the paradigmatic develop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the broader social sciences. First, this study provides a concise overview of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distinct advantages of meta-analytic methods. Second, it systematically reviews 54 meta-analyses published in leading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ublic administration journals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mapping their publication trends and thematic focuses. Third, it summarizes ten essential operational steps for conducting rigorous meta-analyses. Finally, it introduces three advanced meta-analytic approaches, including three-level meta-analysis, and outlines their potential to foster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innovation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Key Words Meta-Analysis; Research Paradigm; Public Administration; Methodological Innovation

公共行政评论

双月刊, 2008年创刊
第18卷, 第3期(总第105期)
2025年6月15日出版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Bimonthly, Since 2008
Vol.18 No.3
Published in June 2025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中山大学
协办单位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
广东省行政管理学会

社 长 肖 滨
主 编 朱亚鹏

联系电话 020-84113029 020-84038746

电子邮件 jpachina@163.com

编辑出版 《公共行政评论》编辑部
(广州新港西路135号; 邮编510275)

印 刷 广州一龙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发行 广东省报刊发行局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传 真 020-84111478

网 址 <http://jpa.sysu.edu.cn>

Administrator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ponsors Sun Yat-sen University

Supporters Centre for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do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ciety

President: Bin Xiao

Editor in Chief: Yapeng Zhu

Tel: 86 20 84113029 86 20 84038746 Fax: 86 20 84111478

Email: jpachina@163.com Website: <http://jpa.sysu.edu.cn>

Edited by Editorial Office of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O.135 Xin Gang Xi Road, Guangzhou, China. 510275)

Distributed by China International Book Trading Corporation

(P.O.Box 399, Beijing, China)



刊号 ISSN1674-2486
CN44-1648/D

邮发 国内46-364
代号 国外BM8839

国内外公开发行
国内定价: 20.00元

ISSN 1674-2486



9 771674 248258